

亲缘关系与家族控制权的配置机制及效率^{*}

——基于制度环境的解释

连燕玲,张远飞,贺小刚,梅琳

(上海财经大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基于制度环境视角,文章分析了亲缘关系在家族控制权配置中的作用和功效。研究结果表明:(1)制度环境越不完善,家族业主越倾向于采用基于亲缘关系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即将关键岗位控制权配置给有亲缘关系的代理人而非完全掌握在职业经理人手中;(2)相对于完全配置给职业经理人,亲缘关系导向的控制权配置模式更有利于家族企业绩效的提升,尤其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其提升企业绩效的效果更加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关键岗位的控制权配置不仅要关注亲缘关系的作用和功效,还要关注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亲缘关系;控制权配置;制度环境;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2)04-0091-11

一、引言

关于权力配置机制的研究是公司治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尤其是家族企业内部控制权配置机制和效率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Eddleston等,2007;贺小刚和连燕玲,2009;连燕玲等,2011)。关于家族控制权配置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分析家族控制权配置的效率问题。如Eddleston等(2007)探讨了家族控制权配置对家族内部冲突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另一方面,分析家族控制权配置的机理。如连燕玲等(2011)从家族代理人的亲缘关系和经营能力角度研究了家族控制权的配置原则,发现家族企业关键岗位的控制权配置主要坚持“能力至上”原则,而家族所有权配置则坚持“亲缘至上”原则。

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能力理论探讨家族业主的控制权

收稿日期:2011-12-2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72065,71172140);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1BGL007);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07SG41)

作者简介:连燕玲(1982—),女,山东临朐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

张远飞(1988—),男,江西遂川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

贺小刚(1971—),男,江西永新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梅琳(1984—),女,湖北安陆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

配置模式选择,即选择与自身有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还是外部职业经理人,以及特定控制权配置模式对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而这些研究忽视了不同制度背景下家族业主控制权配置模式选择的差异性,尤其是其选择特定控制权配置模式的原因。虽然有学者在探讨家族企业控制权配置对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时考察了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但外部制度环境对家族企业控制权配置选择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本文认为家族控制权配置仍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进一步研究:第一,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家族业主的控制权配置模式选择,即中国各地区在市场化程度、法制环境等各方面的不平衡会对我国家族企业控制权配置模式产生怎样的影响?第二,这种影响又会对企业治理效率产生怎样的作用,是否能够促进家族企业价值的创造?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环境与家族控制权配置模式选择

外部制度约束会影响业主对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Peng 和 Jiang, 2010),当然也包括企业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当外部制度环境不完善时,家族业主更愿意将企业的关键岗位控制权配置给与自身有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这是因为:首先,企业之所以成为家族企业是因为其行为的特殊性(Chua 等, 1999),而行为源自一定的家族意图,是家族业主强烈情感意愿的体现。家族业主通过自身控制的优势联盟塑造和追求家族意图,维持家族对企业的长期控制(Litz, 1995)。制度环境不完善时,家族企业的生产活动和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支持,运营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此时,家族业主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加强对企业的控制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从而将关键岗位控制权配置给家族成员。来自同一家族的家族成员之间所形成的终身契约有利于降低外部的不确定性,更有利于家族业主通过自身控制的优势联盟塑造和追求家族意图。其次,在制度支持力度较弱的背景下,企业资源的获取更大程度上依赖于非正式渠道或广泛的社会网络(Peng, 2003)。此时,将关键岗位控制权配置给家族成员在加强对企业控制的同时,可以利用家族成员的各种社会网络对企业进行专有性投资,维持企业的持续经营。最后,外部制度环境不完善无法形成有效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从而企业无法吸纳到守信而忠诚的经理人(储小平和李怀祖, 2003)。此时,将关键岗位控制权配置给职业经理人很可能因经理人为难以观测而使委托代理合约的监督和履行成本高昂(Hill, 1995)。虽然家族代理人也会产生道德风险、搭便车以及在职消费等问题,但家族业主的权威可以将家族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低效率制度导致家族业主倾向于将家族控制权配置给有亲缘关系的代理人。

（二）基于亲缘关系的家族控制权配置与公司经营绩效

本文认为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背景下,家族业主更倾向于将关键岗位控制权配置给有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而且这种配置模式有利于家族企业价值的创造。这是因为:第一,华人社会是一个强调“家族主义”和家族和谐的社会,在资源匮乏的传统中国社会,代表长幼尊卑和关系亲疏的家族阶层式结构有其功能上的重要性(杨国枢,2004)。这种阶层关系经由社会化的手段予以合理化与习惯化,分配资源时在上者多得一些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下者也不会因自己少得而愤懑。基于亲缘关系上下差序的组织决策行为不仅有利于家族成员的分工与约束,还可以避免或减少家族内部冲突而有助于维持家族团结与和谐(杨国枢,1981)。第二,即使存在家族内部矛盾冲突,往往可以通过家族内部会议、家长出面协调等方式解决,尤其当业主在家族中有较高权威时其权威对解决家族内部矛盾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三,将关键岗位控制权配置给家族成员能够激励其贡献各种网络资源,这些资源带来的效益可能大于家族内部存在的代理成本。仅有剩余索取权将变成“被动的企业家”,只有掌握控制权才能发挥“积极的”或“主动的”企业家功能(张维迎,1996),进而通过组织中正式职位发挥自身所拥有的各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的功效。特别是在关键岗位的配置注重家族成员的代理能力时(连燕玲等,2011),掌握关键岗位控制权的家族成员将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与家族企业融合在一起,持续地进行专有性投资,这些专有性资本转化为组织能力后将成为稀缺的、不可模仿的竞争资源,从而帮助家族企业开发新的机会和抵御威胁、获取经济利润并实现价值增值(Barney,1991)。第四,由于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完善,相对于配置给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且缺乏信任和忠诚的职业经理人而言,将关键岗位的控制权配置给有亲缘关系的家族代理人反而是一种较优的选择。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相对于配置给非家族成员,将家族控制权配置给有亲缘关系的家族代理人更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

（三）制度环境对家族控制权配置功效的调节作用

制度之间是相互依赖的,相互依赖的制度构成了整个制度环境的均衡(青木昌彦,2001)。整个制度环境既包括投资者保护法律机制、控制权市场机制等外部正式制度,也包括规范、信任和伦理等被“广为接受”的非正式制度因素。权力配置的有效性体现出其配置机制与制度环境中其他制度安排的适应程度,同一配置模式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具体表现为:首先,市场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力资本发展水平和资源获取效率。在市场化进程较缓慢的地区,家族企业获取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渠道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发展遇到的资源困境更加明显。这意味着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更倾向于利用人际关系网络等非正式渠道获取资源,而不是

通过市场(Choi等,1999)。在这种制度背景下,业主将关键岗位的控制权配置给有亲缘关系的家族代理人更有利于从其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中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绩效。其次,Johnson等(2002)及Cull和Xu(2004)研究表明由于法律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不明确,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私营企业的发展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了降低外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业主将关键岗位的控制权配置给家族成员,使来自同一家族的企业主要所有者或主要经营与其他家族成员形成终身契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有限责任变为无限责任。此时,不完全合约得到了改善,在动荡的环境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从而有利于家族企业更加安全的发展。再次,信任对降低网络化组织内管理的复杂性和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当制度环境不完善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基础较为薄弱,而且无法形成有效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容易引发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此时,将关键岗位的控制权配置给有较好信任基础的家族成员有助于提高决策制定的效率,降低对资源被攫取的担忧,从而更加有利于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最后,市场化水平越低,政府法规和政策越具有波动性和不一致性,此时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系越重要。而家族企业的政治关系可以通过代际传承获得继承,与大客户的关系也是可以继承的(潘必胜,2009)。因此,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将企业权力配置给家族成员有利于保持企业经营的稳定性,从而更加有利于企业价值的创造和绩效的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在市场效率较低的情况下,将家族企业控制权配置给有亲缘关系的代理人更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依据以下标准确定样本(贺小刚和连燕玲,2009;连燕玲等,2011):(1)最终控制人能够追踪到自然人或家族;(2)最终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的公司必须是被投资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数据来源于CCER和CSMAR数据库,样本期间为2001—2008年,共收集得到1289个企业层面的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和模型设计

1. 变量定义

根据研究问题,本文主要关注以下几个变量:(1)外部制度效率(INSTITUT)。借鉴已有研究方法(夏立军等,2005),本文采用樊纲等(2009)的各地区市场化指数。若企业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低于中位值,则INSTITUT为1,否则为0。(2)亲缘关系导向的控制权配置模式(KINSHIP)。本文主要关注家族企业内部关键岗位的控制权配置,如果家族企业董事会职位和高级管

理职位由与业主有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担任,则我们认为业主采用的是基于亲缘关系的权力配置模式,KINSHIP 为 1,否则为 0。(3)企业经营绩效(PERFO)。本文采用 ROA 和 ROE 这两个业绩指标,它们经常被学者用来衡量企业绩效,能够很好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赢利能力(Anderson 和 Reeb, 2003)。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企业规模(SIZE),采用期末资产总值的自然对数。(2)企业寿命(LIFE),即从企业成立到统计当年的年限,并取对数。(3)家族成员规模(FAM),即持股或任职的家族成员总数。(4)家族成员平均年龄(AGE),即持股或任职的家族成员平均年龄。(5)董事长兼任 CEO(DIRE),如果董事长兼任 CEO,则 DIRE 为 1,否则为 0。(6)独立董事所占比例(INDIRE),即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的比值。(7)资产负债率(DEBT),即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8)小股东持股比例(SMALLH),即持股比例 5% 以下的所有股东持股总和。(9)股权集中度(SHR55),采用公司前五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10)股权结构是否发生变化(SHS),若发生了变化则 SHS 为 1,否则为 0。(11)两权分离情况(SEPERA),定义为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比率。(12)高管团队人数(TMT),采用高层管理者的人数总和。此外,我们还设置了行业虚拟变量(INDU,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GICS 划分),以控制其他未观察到的行业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可能产生的影响。

2. 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假设 1,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begin{aligned} \text{KINSHIP} = & \alpha + \beta_1 \text{INSTITUT} + \beta_2 \text{SIZE} + \beta_3 \text{LIFE} + \beta_4 \text{FAM} + \beta_5 \text{AGE} \\ & + \beta_6 \text{DIRE} + \beta_7 \text{INDIRE} + \beta_8 \text{SMALLH} + \beta_9 \text{SHR55} + \beta_{10} \text{SHS} \\ & + \beta_{11} \text{SEPERA} + \beta_{12} \text{DEBT} + \beta_{13} \text{TMT} + \sum_j \gamma^j \text{INDU}^j + \epsilon \end{aligned} \quad (1)$$

为了检验假设 2,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begin{aligned} \text{ROA} \backslash \text{ROE} = & \alpha + \beta_1 \text{KINSHIP} + \beta_2 \text{SIZE} + \beta_3 \text{LIFE} + \beta_4 \text{FAM} + \beta_5 \text{AGE} \\ & + \beta_6 \text{DIRE} + \beta_7 \text{INDIRE} + \beta_8 \text{SMALLH} + \beta_9 \text{SHR55} \\ & + \beta_{10} \text{SHS} + \beta_{11} \text{SEPERA} + \beta_{12} \text{DEBT} + \beta_{13} \text{TMT} \\ & + \sum_j \gamma^j \text{INDU}^j + \epsilon \end{aligned} \quad (2)$$

为了检验假设 3,本文采用 Chow 检验对比(2)式中 KINSHIP 在 INSTITUT=1 和 INSTITUT=0 这两个样本中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差异性。

四、检验结果与讨论

本文首先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对主要连续变量在 1% 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2)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结果显示 VIF 约为 3.500,因而可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时,本文对标准误差进行了企业层面的群聚调整(余明桂等,2010)。此外,考虑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时

序相关和横截面相关等问题,本文还采用 Driscoll-Kraay 标准差进行了稳健性估计(Driscoll 和 Kraay,1998)。

(一)制度环境与家族控制权配置模式选择

表1检验了外部制度环境对家族控制权配置模式选择的影响。列(1)仅引入了控制变量。列(2)中引入了制度效率作为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制度效率与亲缘关系导向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低效率制度导致家族业主倾向于将关键岗位控制权配置给有亲缘关系的代理人。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在列(3)中我们运用 Probit 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也发现在制度效率较低的地区,家族业主倾向于将控制权配置给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在控制了异方差和面板数据因变量的时序自相关性等影响后,列(4)的估计结果仍支持前面的结论。上述分析结果与本文假设1是一致的。

表1 制度环境与家族控制权配置模式选择

	Logit(1)	Logit(2)	Probit(3)	D-K 调整(4)
INSTITU		0.799 [*] (0.485)	0.393 [*] (0.233)	0.053 [*] (0.030)
SIZE	-0.001 (0.004)	0.984 ^{***} (0.306)	0.502 ^{***} (0.165)	0.094 ^{***} (0.018)
LIFE	0.017 ^{**} (0.008)	-0.037 (0.033)	-0.019 (0.018)	-0.007 ^{***} (0.002)
FAM	-0.006 (0.005)	0.211 ^{***} (0.075)	0.098 ^{***} (0.037)	0.014 ^{***} (0.001)
AGE	-0.010 (0.019)	-0.018 (0.022)	-0.010 (0.012)	0.005 ^{***} (0.001)
DIRE	0.096 (0.126)	-0.044 (0.228)	0.003 (0.122)	0.050 (0.032)
INDIRE	0.001 (0.001)	1.077 (0.715)	0.576 (0.398)	0.270 ^{***} (0.086)
SMALLH	0.021 (0.198)	0.010 (0.011)	0.004 (0.006)	-0.001 (0.001)
SHR55	0.024 (0.020)	-0.230 (1.489)	-0.140 (0.798)	-0.203 ^{***} (0.072)
SHS	-0.027 ^{**} (0.014)	-0.318 ^{**} (0.146)	-0.154 [*] (0.079)	-0.062 ^{***} (0.020)
SEPERA	-0.004 (0.006)	0.259 [*] (0.138)	0.126 [*] (0.070)	0.010 ^{***} (0.002)
DEBT	-0.005 (0.005)	-0.052 (0.045)	-0.030 (0.024)	-0.018 ^{***} (0.006)
TMT	-0.042 (0.047)	-0.052 (0.045)	-0.030 (0.024)	-0.018 ^{***} (0.006)
INDU	yes	yes	yes	yes
cons	0.490 (0.326)	8.000 (7.955)	-4.694 ^{***} (1.588)	0.116 (0.153)
Wald 检验 χ^2 值	72.05 ^{***}	53.55 ^{***}	52.13 ^{***}	1697.02 ^{***}
Pseudo R ² /R ²	0.112	0.121	0.121	0.17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二)基于亲缘关系的控制权配置模式与公司经营绩效

表 2 分析了基于亲缘关系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列(1)的检验结果显示,基于亲缘关系的控制权配置模式与企业 ROA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这种控制权配置模式有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列(2)进一步采用 D-K 标准误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同样显示基于亲缘关系的控制权配置模式与企业 ROA 显著正相关。在列(3)和列(4)中,我们以企业 ROE 作为因变量,检验基于亲缘关系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仍支持上述结论。上述分析结果与本文假设 2 是一致的。

表 2 基于亲缘关系的控制权配置模式与公司经营绩效

	ROA		ROE	
	(1)	(2)	(3)	(4)
KINSHIP	0.037*** (0.014)	0.028*** (0.008)	0.068** (0.032)	0.047*** (0.014)
SIZE	0.053*** (0.010)	0.041*** (0.007)	0.103*** (0.018)	0.084*** (0.012)
LIFE	-0.000 (0.001)	-0.000 (0.000)	0.002 (0.002)	0.002** (0.001)
FAM	-0.000 (0.001)	0.000 (0.000)	-0.001 (0.003)	0.001 (0.000)
AGE	-0.000 (0.001)	-0.000 (0.000)	-0.002 (0.001)	-0.001*** (0.000)
DIRE	0.004 (0.006)	0.002 (0.004)	0.004 (0.017)	0.002 (0.008)
INDIRE	-0.033 (0.029)	-0.021 (0.021)	-0.049 (0.054)	-0.027 (0.034)
SMALLH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SHR55	0.035 (0.035)	0.017 (0.014)	0.075 (0.091)	0.024 (0.040)
SHS	-0.010*** (0.004)	-0.015*** (0.002)	-0.020* (0.011)	-0.027*** (0.005)
SEPERA	0.000 (0.003)	0.003** (0.001)	0.001 (0.006)	0.003 (0.003)
DEBT	-0.014*** (0.003)	-0.012*** (0.001)	-0.044*** (0.014)	-0.032*** (0.010)
TMT	0.001 (0.001)	0.001* (0.001)	0.003 (0.003)	0.003 (0.003)
INDU	yes	yes	yes	yes
cons	-0.439*** (0.075)	-0.354*** (0.075)	-0.686*** (0.142)	-0.602*** (0.097)
Wald 检验 χ^2 值	747.24***	19.76***	130.02***	46.49***
R ²	0.130	0.136	0.117	0.121

注:列(1)和列(3)中为基于企业层面群聚调整的标准误,列(2)和列(4)中为 D-K 标准误。

(三)制度环境对家族控制权配置功效的调节作用

表 3 进一步分析了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基于亲缘关系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在 Panel A 中,我们采用基于企业层面群聚调整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分析。列(1)的检验结果显示在制度效率较低的地区,基于亲缘关系的控制权配置模式与企业 ROA 显著正相关;列(2)的检验结果显示在制度效率较高的地区,这种控制权配置模式也与企业 ROA 显著正相关。我们通过 Chow 检验对比分析了处于不同制度环境下的两个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样本中 KINSHIP 的估计系数存在显著差异,在制度效率较低的地区,基于亲缘关系的控制权配置模式更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该结果与本文假设 3 是一致的。在列(3)和列(4)中,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 ROE 进行检验,结果仍支持上述结论。

在 Panel B 中,我们采用 D-K 标准误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列(1)的检验结果显示,在制度效率较低的地区,KINSHIP 的系数为 0.044,在 5%的水平上显著。列(2)的结果显示,在制度效率较高的地区,KINSHIP 的系数为 0.029,在 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Chow 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样本中 KINSHIP 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这也说明在制度效率较低的地区,基于亲缘关系配置控制权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假设 3 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在列(3)和列(4)中,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 ROE 进行检验,结果仍支持上述结论。

表 3 不同制度环境下控制权配置模式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ROA			ROE		
	INSTITUT=1 (1)	INSTITUT=0 (2)	Chow 检验	INSTITUT=1 (3)	INSTITUT=0 (4)	Chow 检验
Panel A 基于企业层面的群聚调整						
KINSHIP	0.039** (0.019)	0.030*** (0.011)	2.130*	0.133* (0.082)	0.078** (0.037)	7.490***
Wald 检验 χ^2 值	51.26***	111.63***		123.19***	100.85***	
R ²	0.134	0.145		0.104	0.131	
Panel B D-K 标准误稳健性检验						
KINSHIP	0.044** (0.018)	0.029*** (0.008)	3.891***	0.106** (0.042)	0.060*** (0.023)	6.540**
Wald 检验 χ^2 值	147.28***	46.19***		9.96***	6.79***	
R ²	0.179	0.145		0.112	0.114	

注:由于篇幅限制,表中未列示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1. 不同的绩效指标。本文对 ROA 和 ROE 进行了行业调整,重新检验了研究假设,结果无显著差异;同时,本文进一步将行业调整后的 ROA 和 ROE 滞后 2 年、滞后 1 年和当年的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检验,结果也无显

著差异。

2. 不同的样本期间。考虑到样本期间的不同选择可能会产生误差(贺小刚和连燕玲,2009),本文还选取2001—2004年、2005—2008年等不同的样本期间进行了检验,结果无显著差异。

3. 不同的行业分类。本文还采用中国证监会(CSRC)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标准划分行业,对研究假设进行了重新检验,结果无显著差异。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制度环境视角对家族企业内部的控制权配置模式进行了分析。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第一,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能力理论探讨家族企业内部的权力配置问题,但不能很好地解释不同制度环境下家族企业绩效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差异性(Davis,2005)。本文则基于制度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家族企业所处制度环境对其内部控制权配置及经营绩效的影响。第二,本文将家族代理人与业主的亲缘关系纳入对家族控制权配置的分析中,研究了制度环境对控制权配置模式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基于亲缘关系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差异性。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学者与实践工作者更加客观地理解我国私营企业控制权配置的动因与制约因素。

本文研究发现低效率制度导致家族业主倾向于采用亲缘关系导向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即将家族控制权配置给有亲缘关系的代理人,而不是完全掌握在职业经理人手中。此外,相对于完全配置给职业经理人,亲缘关系导向的控制权配置模式更有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尤其在制度效率较低的情况下,其提升企业绩效的效果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家族控制权配置不仅要关注亲缘关系的作用和功效,还要关注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

* 本文还得到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CXJJ-2011-323和CXJJ-2011-371)的资助,同时感谢上海财经大学民营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CPEC)的数据支持。

主要参考文献:

- [1]储小平,李怀祖.信任与家族企业的成长[J].管理世界,2003,(6):98—104.
- [2]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 [3]贺小刚,连燕玲,李婧,等.家族控制中的亲缘效应分析与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0,(1):135—146.
- [4]贺小刚,连燕玲.家族权威与企业价值: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9,(4):90—102.
- [5]夏立军,方轶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5):40—51.

- [6]连燕玲,贺小刚,张远飞.家族权威配置机理与功效——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1,(11):100—112.
- [7]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8]杨国枢.中国人的性格与行为:形成及蜕变[J].中华心理学报,1981,(1):39—55.
- [9]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J].经济研究,1996,(9):3—15.
- [10]Amit R,Ding Y,Villalonga B,et al.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prevalence and value of family firms[R]. Working Paper,2009.
- [11]Arregle J,Hitt M A,Sirmon D G,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Attributes of family firm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7,44: 73—95.
- [12]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1991,17: 99—120.
- [13]Chen C,Li Z,Su X,et al. Rent-seeking incentives,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s,and the control structure of private firms: Chinese evidence[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1,17: 229—243.
- [14]Chrisman J J,Chua J H,Kellermanns F W,et al. Are family managers agents or stewards? An exploratory study in privately held family firm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7,60: 1030—1038.
- [15]Chrisman J J,Chua J H,Litz R A. Comparing the agency costs of family and non-family firms: Conceptual issues and exploratory evidence[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4,28: 335—354.
- [16]Davis J H,Schoorman F D,Donaldson L. Toward a stewardship theory of managemen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7,22: 20—47.
- [17]Eddleston K A,Kellermanns F W. Destructive and productive family relationships: A stewardship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7,22: 545—565.
- [18]Jensen M C,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 305—360.
- [19]Litz R A. The family business: Toward definitional clarity[J]. Family Business Review,1995,8: 71—81.
- [20]Peng M W.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3,28: 275—296.
- [21]Peng M W,Sun S L,Pinkham B,et al. 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 as a third leg for a strategy tripod[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09,23: 63—81.
- [22]Peng M W,Wang D,Jiang Y.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 focus on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8,39: 920—936.
- [23]Peng M W,Jiang Y. Institutions behind family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large firm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0,47: 253—273.

Kinship and the Efficiency of Family Control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LIAN Yan-ling, ZHANG Yuan-fei,
HE Xiao-gang, MEI L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kinship in family control distribution from the angle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firstly, more imperfec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leads to the family entrepreneur's preference for the kinship-based control distribution mode, that is to say, key positions are allocated to the agents who are some relation to the family entrepreneur; secondly, compared to complete manager-oriented control distribution mode, kinship-oriented control distribution mode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increase in family business performance, especially under imperfec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t arrives at a conclusion that the control distribution of key position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not only the function of kinship but also the effect of exter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kinship; control distribut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business performance

(责任编辑 康健)